

“文革”日记发表，字字皆是血的控诉

巴金写于1973年—1976年的日记近日发表在第六期的《收获》杂志上，系首次问世。这些日记写作的1973年，“文革”仍在继续，而在此前一年，巴金妻子萧珊患癌去世，刚从干校归来的巴金深陷悲痛之中。

“萧珊已去，以沫相濡的日子不再，心中的一切向谁倾吐？大概只有求助于纸和笔。”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在一篇解读巴金日记的文章里说，巴金“文革”后期的日记如实记录了巴金的所见所感，“为那段长夜漫漫的岁月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证词”。这些日记巴金写了撕，撕了又写。虽然字数不多，但在周立民看来，却是那个时代具体实在的记录，“而今看来，又何尝不是字字读来皆是血的控诉？”

巴金晚年的代表作《随想录》也在今年出版了“巴金诞辰110周年纪念版”。作为最后一位离开人世的“五四时期”作家，巴金一生发表了二十多部中长篇小说，七十多篇短篇小说，二十多部译作及众多散文随笔，共计一千三百多万字。他的“激流三

部曲”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等作品早已是现代文学公认的经典，但在很多文学评论家看来，真正奠定了巴金在思想界深远意义的著作还是他晚年写就的《随想录》。

今年上海书展期间，著名巴金研究专家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在一场读书会上说，巴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应该为现实生活服务，为改造社会服务，所以他的小说总是写革命、战斗、呼喊、追求。巴金在其早年代表作《家》的扉页上便题写了这样一句话：“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底‘我控诉’。”有亲历者后来回忆，当时许多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，并不是读了马列著作，而是因为受《家》的影响。

“1949年后，巴金改变了写作的风格，以前他写的都是悲剧，解放以后他就变成一个歌颂型的作家。”陈思和说。抗美援朝期间，巴金先后两次到朝鲜前线去体验生活，回来之后写了很多歌颂抗美援朝的文章。他还写文章歌颂人民公社、大跃进。陈思和分析，巴金的内心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痛苦，他也深知作为知识分子潜

的危险，“就把自己放低，放成一个整天改造自我的人，但是他心里面很明白，这样的做法是违背自己良心的”。

陈思和说，晚年的巴金觉得自己欠了读者一笔债，因为读者那么信任他，他却写了那么多错的文章。他曾感叹道：“十七年中没有写出一篇让自己满意的作品。”这也直接催生了《随想录》的写作。

然而，“文革”时，巴金依然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命运。当时尚在念初中的著名诗人赵丽宏亲眼目睹了巴金被批斗的经过，“在上海杂技场开批判巴金会，这次批判大会是电视直播的，当时也是造反派的一个创造，我第一次看到巴金的形象，是一个忧伤的巴金，一个无奈的巴金，他的头发是灰白的，他站在那里，没有说一句话，整个过程都是别人在批判他，批判者用最严厉的、最恶毒的语言批判巴金，他只是默默地听，胸前戴着很大的牌子。”巴金在《随想录》里也说，如果不是萧珊，“文革”他是过不去的，士可杀不可辱，很多知识分子以死来抗议。

真话的力量

——纪念巴金诞辰110周年

本报记者 吉祥

当我们谈论巴金时，我们在想什么？

11月25日是巴金110周年诞辰纪念日，如同鲁迅希望人们忘记他，巴金也想被人遗忘，他把骨灰撒入大海便是例证。然而，去世9年之后，巴金依然在被反复言说。

人们在巴金作品研讨会上，讨论他的文学成就，也从摄影展的一张张老照片里，品读这位头发花白的世纪老人爽朗而开心的笑容。在巴金的家乡四川，小学生用向日葵摆出“巴金”的字样，并立下“说真话，做好人”的誓言；而在巴金长期生活的上海，青年作家们朗诵着巴金的文章，纪念这位“五四之子”的文学成就。当然，巴金被谈论最多的，依然是他晚年执着地对“讲真话”的呼吁，这简单的三个字至今依然有着非常强的感召力。



▲《随想录》
巴金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▼《巴金选集》
巴金 著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悦读·分享

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“青未了”

忏悔与反思，巴金履行了一位作家的使命

“文革”后的巴金重新找回了自己，在《随想录》写作之初，他就坚决表示：不写遵命文学。

1978年底，已经75岁高龄的巴金开始动笔。“发现中国社会有那么多的问题，所以他决定用《随想录》这个名字发一组文章，他看到社会上有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。”陈思和说。在书的总序言里，巴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“这只是记录我随时随地的感想，既无系统，也不高明。但它却不是四平八稳，无病呻吟，不痛不痒，人云亦云，说了等于不说，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。那么就让它们留下来，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，参加伟大的‘百家争鸣’吧。”《随想录》的第一篇文章《谈〈望乡〉》写于1978年12月1日，半个月之后的12月18日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。

1979年5月，巴金以中国作家代

表团团长的身份访问法国，这是巴金时隔半个世纪后再次来到巴黎。巴金研究专家李辉曾说，重返巴黎是晚年巴金与青年巴金之间精神行程的一次连接。巴金将法国大作家卢梭视为自己的老师，后者的《忏悔录》对他影响深远。他曾说：“我勉励自己讲真话，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。”在谈及这次重返巴黎时，巴金说：“爱真理，爱正义，爱祖国，爱人民，爱生活，爱人间美好的事物，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。”

回国后，巴金继续着《随想录》的写作，评论界也经常将他的文章与《忏悔录》相提并论。晚年巴金延续着从“法国老师”那里继承来的反思精神，一写八年，前后共计四十多万字，巴金的思考越来越深。他呼吁讲真话：“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

地活下去，现在我的座右铭是尽可能多地多说真话，尽可能少做违心事。”他也批判当初的怯懦：“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？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？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，失去了自己的思维，甚至自己的语言？”

在《随想录》（巴金诞辰110周年纪念版）的品读会上，陈思和说，阅读《随想录》一定不能只看它纸面上的东西，一定要了解当年的情况。“巴老是一个跟所有作家都不一样的人。所有的老作家在‘文化大革命’统统被打倒，被打倒，被抄家，被侮辱。‘文革’后这批作家恢复名誉了，平反了，又搬到自己家里去了，就知难而退了。这样的作家是占多数的，可以说当时唯独真正履行自己作家使命的就是巴金。”

社会依然需要讲真话，《随想录》并不过时

晚年的巴金受困于帕金森的折磨，写作变得越来越困难。有一次陈思和去看望巴金，巴金告诉他手不会动了，“我写东西，钢笔架到右手上，手放在纸上却动不了，急着要用左手去推右手。”

陈思和在多个场合推荐巴金用手“推出来”的《随想录》，后来他还在研究生课程上讲《随想录》文本细读，整整“读”了一年。他告诉学生，读《随想录》必须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，否则读不出味道。“你如果光从字面上看，他可能写得非常简单，非常单纯。可是如果你了解里面有很多故事、很多掌故，你就会读出这本书是一部百科全书。”陈思和说，巴金把从1978年开始到1986年这一时期思想界的信息、文

艺界的信息，通通写进去了。他也不赞成现在一提《随想录》就觉得是反思“文革”，控诉“文革”，“其实我觉得，这本书真正的意义不是反思‘文革’，是对上世纪80年代这样一个时代，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、复杂的时代，他做的一个伟大的记录。”

周立民则担心，很多年轻读者对巴金并不了解，很多人对巴金的认识，都是从教材里得来的非常概念化的空洞印象。陈思和也发现，很多青年人嘲笑巴金，觉得巴金很胆小，活到100岁了，还站在那里说要“讲真话”。“讲真话有什么了不起，幼儿园的小孩子都知道不要撒谎，要讲老实话，对不对？”陈思和反问：“我们每个人都做到了吗？如果连老

实人都做不到，何谈做一个好人呢？从这个角度说，《随想录》的意义远远没有被认识。”

著名作家马识途也在他的新著《百岁拾忆》中记述了一次关于巴金“讲真话”的争论。他说，就在大家赞赏巴老讲真话时，某个报纸却有文章说：巴金提倡说真话，但真话并不等于真理。显然有所指。“巴老曾经说过，他说真话，并不是他说的都是真理，也不要人们以真理来评价他的真话。确实，真理是客观存在的，是要靠实践来最后证明的。真话却是出于一个人的主观的见解，出于自己的肺腑，述之于主观感情的。这种真话不一定是真理，但发自内心的真话，总比那些喧腾一时的假的‘真理’要好。”